

一個學期的交換生涯即將結束，回首半年的臺灣生活，頗有一些感觸。記錄下來，作為這段經歷的留念。-----

尹姝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所現當代文學臺港澳文學方向碩士研究生

2016/2/16~2016/7/31 交換於台灣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一、 文化衝擊

2月16日，我坐上從太原飛往桃園機場的飛機，在想像和期待中開始了臺灣之行。恰好和一個剛剛結束山西旅遊的臺灣觀光團，於是這些對交換生好奇的臺灣客人們一路上和我聊天。台南的阿伯講兒時二二八後緊張空氣和困苦生活，外省第二代的叔叔講來大陸的種種驚訝，台中的姐姐則傳授我一個人環島省錢的秘訣。突然有幾分奇異的悸動和難以置信——那個在書本中讀了兩年的臺灣，馬上就到眼前了！

下飛機後，過海關、辦電話卡、買公車票，皆是這些臺灣同乘的朋友手把手幫我做的，之後一個人轉車，行李也總有人幫我提上提下。超乎想像的第一乘弄得我我暈暈乎乎的，再加上都講中文，讓我總沒有所謂“出國”的訝異。直到進了高鐵站，看到寫著“臺灣精神，世界第一”的牌子，我才終於有了真實感——哈，這裡真的是臺灣啦！

最初的文化衝擊也由這個時候開始。由於大陸的火車站都是分候車廳等車而非以南下北上月臺區分，因而我下大力氣盯著標示研究許久，才敢放心走下去等車。月臺不是露天的，此時列車還未進站，空空的鐵軌看上去像北京的地鐵一號線。我目瞪口呆地怔了一會兒，想，完了，看半天還是找錯了地方，怎麼走到了捷運站？月臺上沒有一個工作人員，我抓著等車的幾個旅客挨個兒問了一遍，才確定到新竹果真在此處等車。

下飛機是上午十一點，待我大包小包連滾帶爬搭計程車來到學校，已是下午兩點。交大的博愛校區真靜啊，沒有行人，只有宿舍前工地的聲音。兩人合抱的老榕樹垂著蒼棕的氣根；松塔散落在綠草地上。宿管幫我把行李提上博士宿舍逸軒，輕聲跟我說：“你舍友可能是外國人哦。”我還愣著，406的房門已被敲開。“you have

a new roommate.”宿管說著，已經把我塞進了房間。舍友一連叫了四五個“oh”。後來我才知道她住這裡三年從沒有過舍友，我冒出來，學校沒事先通知，慌得連她們穆斯林見男生必戴的頭巾都沒系。我也有點手足無措了——雖然是英文系畢業，和講英語的人同住一舍還是第一次。

剛扔下行李，臺灣導師彭老師就打電話來，關心我採購生活用品之事，我便很不客氣地讓老師帶著去了大潤發。這時候我才發現繁體字的威力：讀了兩年的繁體版小說，但在看著不熟悉的生活用品以密密麻麻的字標著和大陸叫法不同的名字，辨認起來還頗有難度。再加上洗髮精、衛生紙之類都以我從未見過的超大包裝擺著，真讓我看傻眼了。導師看我在商品前怔忡的樣子，開玩笑說：“你在倒時差嗎？要趕快習慣這邊人做事和生活的方式哦。”這句提醒讓我頗為受用。在之後的日子裡，彭老師點點滴滴教給我很多臺灣的生活規範，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要入鄉隨俗，多看多學，因而不致為臺灣朋友所嘲笑，還得到了頗為交心的朋友。

初來新竹，最不能適應的是亂指路的穀歌地圖。博愛校區並非四方四正，地圖不靈，我又沒有認識的本宿舍朋友，所以很怕迷路，於是竟靠兩個小麵包挨了兩天。第三天中午，我到廚房接水，一位酷酷的印度女生正在炒飯。濃郁的咖喱和孜然的香味直鑽到我心裡。我涎著臉問：“Is it traditional Indian food?”餓狼般直勾勾地盯著鍋中之物。她笑著給我滿滿盛了一碗，我三兩口就吞掉了。後來說起此事，我都裝作可憐巴巴的樣子，說這是在臺灣吃到的第一次熱飯。午餐後這個印度姑娘用機車載著我在學府路兜了一圈風，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美食都藏在這裡！自此我便擺脫了挨餓狗的慘況，一個學期結束，我已是此街各個小店的賞味和聊天大仙。

就這樣昏頭漲腦的，我的交換生生活正式開始。

二、鄉愁

若要用一個詞概括臺灣對於大陸人意味著什麼，我可能會說是一種“鄉愁”。1980年有這樣一首詩：

“那是十多年前，/我沿著紅色大街瘋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歡叫，/後來，我的鑰匙丟了。/心靈，苦難的心靈，/不願再流浪了，/我想回家....”

那麼，這丟失的鑰匙和家園可以在那裡找到呢？反思文革的同時，鄧麗君的歌、余光中、三毛、瓊瑤等人的文學被大量引進。剛從激進狂潮中掙扎出來的大陸人突

然發現，這個與我們同文同種但被描述成敵國的地方，原來還保有我們失掉的傳統文化和正常的人性，也實踐著現代啟蒙理性的承諾。雖然沒有明言，一個世代的大陸人，都把臺灣看作中國的另一種可能性。在我們的想像中，臺灣既是所謂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又是政經現代化的成功典範。當然，這種幾乎和國民黨對其治下“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描述不謀而和的印象，難免會讓經歷過白色恐怖的臺灣民眾嗤之以鼻；而大陸人起於此種印象的對國民黨的好感，正好和臺灣人對此論述的惡感乖謬，這幾乎是阻礙兩岸民眾互相瞭解的最初心結。

那麼，相比於大陸，臺灣有沒有“很發達”？到臺灣之前，我聽到遊過臺灣的人往往會說，臺灣是個民風淳樸的大農村。我只把這話當成自大狂的無端貶低，沒往心裡去。但著實開始在新竹生活，我還是有幾分不習慣。因為在高中課本上學過的新竹，是一個矽谷一樣明媚而發達的地方，所以剛剛看到 1930 年代老上海式的霓虹燈和商店門面，我真的吃了一驚。習慣了北京的光鮮和家鄉的城市翻新速度，所以見塑膠店牌用得黢黑褪色還不更換的真的很稀奇。當博愛校區還是交大唯一校區時，學府路上陸續搬來一排小吃店家，那已經是十五、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主校區搬走了，學府路慢慢沒落，買賣尚可的店家就成了永久性商戶。“我在這裡都開了二十年了，”很多老闆對我這樣說，“你相信嗎？原來我的店能排兩百人的長隊！後來你們大陸發展起來，在科學園區工作的人少了，生意差多了。”老城區的滄桑都在這幾句閒話裡。也許竹北新城區的興起也分了這裡的一杯羹？總之這一帶的街巷在時間裡凝固了。

在新竹等車也是一大苦事。起先我不敢相信，二路車真的是一小時發一班，所以錯過了一輛車我並未在意。記得當時是晚上 5 點 45 分，我已等車等到腿軟，所以忍不住問同在站上的同學車什麼時候來。幾個女孩幫我查詢好一陣，告知我六點十五分來車。“那麼久？！”我大驚。“還好吧，也就半小時而已...”這話雷得我半晌沒回不過神來。此後，連七分鐘捷運都沒耐心等的我養成了在公車站牌旁肅立一小時的功夫，這種等車也成了我外出旅遊時的常態。

從上述例子看，臺灣似乎近年確實狀況不良。“臺灣二十年沒發展了！”很多人這麼說。“兩個八，臺灣打到趴”也是百姓抱怨 2000 年以來為政者時常說的話。但是，臺灣的富庶和現代化程度之深，並不是用這樣的淺表現象可以判定的。

記得彭老師到北京市郊的冷泉村參觀時，曾驚訝地說，首都旁邊竟然有這樣窮的地方，臺灣的城鄉差距可沒這麼大。直到我去了原住民部落，才真正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去的布農族部落在南投縣信義鄉東埔一鄰，是大陸導師的田野點。由於曾經學到的原住民文學都是 1980 年代原住民運動時的作品，裡面所描寫的原鄉都破敗荒涼，窮困潦倒，因而我做足了心理準備去住鐵皮房茅草屋。然而到了到了部落，我才發現自己簡直太低估這裡的經濟水準了。這個五口人的布農家庭，有一座一層樓的漂亮房子，堂前庭院植著蘭花、桂花，懸著吊蘭和畫眉鳥，中庭是一塊用作餐桌的巨石，可供二十多人一起用餐。屋後種著果樹，養著十幾隻肥嫩的雞、鴨、鵝。房內裝潢不亞於任何一個城市家庭，厚厚的地毯蓋在木地板上，周圍圍著軟沙發。這家有一輛小卡車和一輛轎車，從車子外觀的陳舊程度看，大概已經用過一些年頭。他們甚至還有一條需要吃專業寵物罐頭的好狗。——簡直是我想像當中美式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模樣，然而他們在臺灣已經是需要被保護的“弱勢群體”，是經濟條件相對很差的。

在這樣一個均富社會裡，人的社會地位也相應比較平等。由於一般臺灣家庭都可以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教育成本會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中，所以不論職業，臺灣人的工資水準普遍不低。真正重體力、環境差、工資低的工種越來越多地由外勞承擔。而本地人，即便是大量由原住民承擔的餐飲和美髮業，收入也有 5000 人民幣左右。相比我在家鄉做過的那份保底月薪 1500 人民幣、每週工作五十小時以上的課程銷售工作，真是天壤之別。因此，就臺灣的公民而言，每個人都是有一定購買力的消費者，而對於生產和銷售者而言，每個人的價值不會有太顯著的區別，故不會給以赤裸裸的歧視。這種社會地位的平等大概是經濟地位的平等所帶來的吧。

臺灣另一個令人愉悅的地方是社會治安非常好。有時晚上十點多一個人走夜路，也從不覺得害怕。鄰舍的香港姑娘甚至常常半夜抄小路回宿舍，也沒有遇過壞人。盜竊也是不常見的。學姐載我出去玩，人離開時機車安全帽就放在座位上，不需要怕人順手牽羊。印度的朋友在車棚停機車常常不上鎖，不曾擔心被人騎走。舍友習慣將手機松松得插在上衣口袋裡，就算外面露著一半也沒被偷過。捷運和列車均不設安檢，以前一直很太平，近年經濟變差，惡性事件才多起來。我想，“倉廩足則知禮節”的道理，可能不在於人生活無憂就想有精神追求，而是殷實的社會裡貧富差距小，最貧窮的也能有相當安穩的生活，所以沒必要昧著良心取不義之財。

正是這樣富裕、安全、平等的社會環境，造就出人與人之間的溫情、禮讓和互助。有時我搬不動重東西，還沒想好要不要求助，就已有有人伸出了援手。在路上等公車時，也常有好心人免費載我一程。一個人去旅行時，我更喜歡用谷歌地圖找路，不是因為問路時當地人不熱心，而是被問的人為了給我正確指路，往往會掏出手機幫我查詢，或者動員周圍一群家人、朋友一起幫我想最佳路線。這實在太勞煩別人了。這些助人之人，幾乎都出於本能、不假思索，這份陌生人之愛，也許是成熟的現代社會中公民的必然素質吧。

如果我們有機會接觸臺灣的行政人員或公職人員，這種感慨會更加強烈。在我辦理入台手續時，我自己學校的百般設限，辦事困難的同時得不到外事處老師應有的尊重。而和我素昧平生的項目秘書曾美儀小姐，卻提供了最清晰簡明的指導，最大限度地提供大陸方面所需材料，而交大方面一系列蓋章她全部幫忙處理。尤其在我陸方學校不斷反復，幾次變更行程、需要重申請入台手續時，我很是過意不去，想著若太讓她為難就放棄來台，她卻鼓勵我堅持，並一次次幫我重辦所有手續，這份禮遇，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我只是在做我該做的啊，不要這麼客氣啦。”她總是這樣回答。從美儀老師這裡，我明白了公職不是權力，而是一份責任，盡力幫助同學、與學生成為朋友，在她的認知中是那樣理所當然。這並不是一種獨特的想法，而是這裡行政人員一種普遍的思維模式。可以推想，如果沒有學校自上而下管理人員耐心服務學生的風氣，不論個別的老師多善良體貼也難以有效為學生提供幫助。同時，我親身的體驗是，不論在學校辦理各種手續，還是打電話向移民署詢問出入境相關事宜，都能感覺到他們真誠地為我考慮，盡力幫我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只是小小一個學生，與他們也無“關係”，他們為何這樣熱心呢？我想，大概是出於不將自己定義為統治者、而將自己定義為說明者和服務者的“民主的習慣”吧。

行政人員的謙遜使社會不需要崇拜和汲汲於權力，這種氛圍也有利於促進對勞動的尊重和其他社會成員的尊重。在各個公共化妝間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提示語：“請疼惜清潔人員的辛勞，尊重下一位使用者的權利...”來過臺灣的人都有體會，這裡即使是偏僻小地方設備陳舊的洗手間，都非常乾淨。這並非由於清潔工不停處理客人的狼藉，而是由於使用者能自覺珍惜他人勞動成果，也儘量避免給別人造成不便。同時，來到臺灣，我意識到丟垃圾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垃圾箱分成廚餘、紙類、金屬類、塑膠類等等，基本上丟垃圾者都會嚴格遵守這些類別。在提供午餐的

大型學術會議上，用過的便當盒會被整齊地碼成一摞，一次性筷子和塑膠筷子袋分開丟棄，而橡皮筋統一丟在一個小盒子裡。可以想見，每個人小小的規範行為給清潔工人帶來多大的方便、減輕了多少的勞動，同時也對共同體中生活的其他成員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打擾。

很多來過臺灣的人將這樣的素質歸結為對中華文化的繼承。我只能說，有道理有卻不準確。先賢確實教導我們溫良恭儉讓，這些在大陸文革時砸得粉碎的價值觀在臺灣得到了保存。但是不論哪個地域的“中華文化”，包括臺灣自古承襲的閩南和客家文化，並沒有太多的營養來教導人們如何突破人情社會的局限，如何像善待熟人一般善待陌生人。這些現代性的品質，恐怕是服務於商品經濟發展和自由市場需要的社會規範，也是政治自由所要求的公民素養。如此說來，我們與其寄望於復興“傳統文化”，不如思考如何深化“現代化”。

後天就要回到大陸了。我又像初來之時一樣有些不真實感。博愛的幾條大狗聽熟了我的腳步聲，早已不再對我大吠。學府路上面店的阿姨和早餐店的小姐，看我進店就知道我要胡椒粉加量的燙青菜和多加肉鬆的飯團。同樓的幾位舍友，關著房門我都知道誰從我門前經過、幾點鐘去找哪個朋友聊天她一定在宿舍。我對生活半年的方寸天地、這個小天地對我，都太過熟悉。這個熟到也許幾年後，我閉著眼睛就能數出門前五棵榕樹、兩條水溝、一隻貓咪的地方，大概永遠不會再來了。離別，竟是這樣恍惚的傷懷。我感激這片給我帶來感動和感慨的土地，祝福這裡我熟識和不相識的人們，永遠和樂、平安。